

河北

方言与普通话

协同发展研究

马美茹◎著

HEBEI FANGYAN YU PUTONGHUA XIE TONG FAZHAN YANJIU



非外借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WWW.NEUP.COM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河北方言与普通话

协同发展研究

马美茹 著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WWW.NNUP.COM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河北方言与普通话协同发展研究 / 马美茹著. —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5681-2881-0

I. ①河… II. ①马… III. ①北方方言—方言研究—
河北 ②普通话—研究 IV. ① H172.1 ② H1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54846 号

□ 策划编辑: 王春彦

□ 责任编辑: 张 琪 张辛元 □ 封面设计: 优盛文化

□ 责任校对: 王中韩 王春林 □ 责任印制: 张允豪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市净月经济开发区金宝街 118 号 (邮政编码: 130117)

销售热线: 0431-84568036

传真: 0431-84568036

网址: <http://www.nenup.com>

电子函件: sdebs@mail.jl.cn

河北优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装帧排版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幅画尺寸: 170mm×240mm 印张: 12 字数: 197 千

定价: 42.00 元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又是文化的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方言和普通话都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方言是语言的变体，而普通话是一个国家的主流语言。方言和普通话是因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又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二者长期共存并相互影响，形成一种互动的关系。随着一些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方言和普通话二者之间的接触情况变得异常复杂。如何促进二者协同发展，逐渐成为学术界比较关心和重视的课题。世界各民族的语言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时而分化，时而统一，方言就是在分化和统一的复杂过程中形成的。

自我国 1986 年把推广普通话作为国家语言工作的首要任务以来，推广普通话和保护方言的关系就一直是语言学者们普遍关注的问题。我国方言分歧严重，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推广普通话这一政策符合国家区域经济发展与文化交流的要求，只有以共同的语言为基础，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才有可能全面发展，做到全国一盘棋。但是，方言可以说是地方文化和风俗的活化石，任何一种方言的消失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一种损失，也就意味着我们了解这一地区文化的最有效的途径消失了。推广普通话势在必行，保护和发展方言也责无旁贷。推广普通话和保护方言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水火不容的，而是协同发展的关系，我们要客观对待二者的关系，尊重规律，顺应发展。

推广普通话是我国新时期的一项国策，需要不断努力，但是，方言的发展和保护也必须得到重视。如何达到二者之间的动态平衡，双语双方言问题也引发了学者们的思考。有学者认为双语双方言能够使我国的语言生活达到和谐的状态，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双语双方言会加快弱势语言的消失速度。保护方言也要分轻重缓急，使资源的利用达到最大化，集中力量，应该像对待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一样，先做好方言活力排序工作，对其中的濒危方言更要高度重视。方言保护最有效的途径是继续通行，要让人们看到方言使用的利益和价值，把方言保护与地方

经济发展建设结合起来，这才是方言保护的根本途径。除此之外，还要保障方言的使用领域。

河北方言属于北方方言中的一类，是典型的北方话，虽然在词汇方面与普通话很接近，但大部分地区的方言在发音方面与普通话比较还是存在较大差异。河北方言在声母、韵母及声调方面都有自己独特的发音方法。语言与当地人性格、习俗等基本生活有密切关系。河北虽然靠近京津，但语言方面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在调子上。河北话发音较平，而且一般句子的结尾多用去声。这样的发音模式就会显得缺乏韵味儿，也可以说比较平实，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河北人的性格特点。当代的影视作品和出版刊物对河北方言的使用少之又少，平常生活中也不多见，即使河北省是一个人口大省，漂泊在外的人也不在少数。究其原因就在于，河北方言与普通话发音比较接近，所以河北人学起普通话来都比较容易，且接近标准。于是出门在外的河北人大都操着一口较标准的普通话，就连河北老乡在别地遇到也基本以普通话作为交流语言。所以，对河北方言与普通话的协同发展研究很有必要。

我们结合汉语方言学和应用语言学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再结合作者多年来的研究心得，采用综合理论分析法、实地调查法、案例分析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对河北方言与普通话协同发展这一课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主要分为普通话的语音问题，河北方言与普通话的结构差异，语言接触对河北方言的影响，促进二者协同发展的策略等内容。本研究基本相当于区域性的方言与普通话发展的调查研究，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也有实用价值，对河北方言的发展与保护，普通话的推广与普及有重要意义。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汉语方言的研究情况	1
一、古代汉语方言研究阶段	1
二、近代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对汉语方言的研究阶段	4
三、现代汉语方言的研究阶段	6
四、新时期汉语方言的研究阶段	8
第二节 河北方言概况	9
一、河北方言分区及标准	10
二、河北方言特点	12
第三节 河北方言研究现状	14
第二章 现代汉语方言概况	17
第一节 方 言 概 念	17
一、方言概念	17
二、方言的类别	18
三、总 结	22
第二节 方言产生的原因	22
一、方言产生的基本原因	22
二、语言系统的内部演变与外部分化	23
三、语言演变的社会条件	25
第三节 汉语方言分类情况	26
一、汉语方言分区的依据	26
二、汉语方言分区的历史	27

三、汉语方言分类与分区的区别	29
四、汉语方言分区概况	32
第三章 普通话的语音知识	44
第一节 普通话的语音体系	44
一、关于语音的基本知识	44
二、普通话音系	48
第二节 普通话的声母系统	51
一、声母的发音情况	51
二、声母辨证	55
第三节 普通话的韵母系统	61
一、韵母的分类与发音	61
二、韵母辨证	68
第四节 普通话的声调系统	71
一、声调性质	71
二、普通话的声调	72
三、声调辨证	73
第五节 普通话的特殊音变	75
一、变 调	75
二、轻 声	77
三、儿 化	79
四、语气词“啊”的音变训练	80
第四章 河北方言与普通话语音比较	81
第一节 河北方言语音的特点	81
一、河北方言声母特点	81
二、河北方言韵母特点	84
三、河北方言声调特点	87
第二节 河北方言与普通话常见语音差异	88
一、河北方言声母与普通话声母的主要差异	88

二、河北方言韵母与普通话韵母的主要差异	92
三、河北方言声调与普通话声调的主要差异	97
四、河北方言音变与普通话音变的差异	99
第五章 河北方言与普通话词汇比较	104
第一节 河北方言词汇的特点	104
一、表示特殊的生产活动、经济生活、风俗习惯、人际关系、地理环境的土语词 ...	105
二、保留着的古语词和因与其他民族接触而形成的特殊词汇	105
三、河北方言词汇的结构特点	106
四、河北方言基本词汇说明	108
第二节 河北方言与普通话常见词汇的差异	109
一、与普通话有对应的词汇	109
二、与普通话无对应的词汇	111
第六章 河北方言与普通话语法比较	113
第一节 河北方言语法的特点	113
一、保留了一部分近代汉语的语法现象	114
二、内部有较明显的区别	115
第二节 河北方言与普通话常见语法的差异	116
一、河北方言与普通话词法差异（词缀）	116
二、河北方言与普通话词类差异	127
三、河北方言与普通话句式差异	134
第七章 普通话发展与河北方言	139
第一节 普通话的起源与发展	139
一、普通话的起源	139
二、古代普通话的发展	139
三、近代普通话的发展	141
第二节 普通话的推广与普及	144
一、普通话的确定	144

二、普通话的标准音	145
三、普通话的普及	146
四、特殊说明	148
第三节 河北方言与普通话的接触讨论	149
一、关于地方普通话	149
二、方言与普通话相互影响	150
三、方言与普通话的兼用现象	152
四、方言与普通话接触产生的语言变体	152
五、河北方言与普通话接触情况	153
六、河北人应该怎样学习普通话	155
第八章 河北方言与普通话的协同发展	157
第一节 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	157
一、联系	157
二、区别	157
三、推广普通话与保护方言关系问题	158
第二节 普通话与方言的共存情况	161
第三节 普通话与河北方言协同发展的必要性	170
第四节 推广普通话与保护方言的思路阐释	172
第五节 普通话与方言的共存的可行性	177
第六节 普通话与方言在具体领域的协同发展	178
参考文献	183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汉语方言的研究情况

方言是语言的支派和变体。方言又称作“土语、土话、一白”，旧时也称作“乡音、乡谈、乡语”等。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了“方言”这个词，指的是各地用语。两千多年前，西汉扬雄就著有《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东汉应劭将该书简称为“方言”，进而又在《风俗通义序》中将“方言”作为一个特定的词语来使用：“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輶轩之使求异代方言，还奏籍之，藏于密室。”方言可以分为地域方言（regional dialect）和社会方言（social dialect）两大类。方言学对地域方言的研究历史较长，成果较多，对社会方言的研究历史较短，成果较少。古希腊也有 *dialektos*（διαλεκτος）一词，指一个地方的居民所说的话。英语 *dialect* 一词本义也指地域方言。可见，“方言”的本义是与地域联系在一起的。

方言是语言的变体。语言和语言变体的关系是一股与个别、共性与个性的关系。这是一种共时关系，而不是历时性的衍生关系。一般是抽象的，它不能脱离个别而独自存在，只能存在于个别之中。个别才是具体的、现实的。人们日常使用的语言都是具体的，因而都是语言的变体。平常说中国人使用汉语，但汉语是一般意义上的语言，而不是具体的语言变体。因此，从学理上分析，上述说法并不准确。准确地说，每一个中国人日常使用的并非抽象的汉语，而是具体的汉语方言，例如北京话、上海话、广州话等。所以，对于汉语方言的研究从古至今一直没有断过，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古代汉语方言研究阶段

中国古代对汉语方言的研究可以称为传统汉语方言研究时期。传统汉语方言学是传统中国语言学的组成部分，不过它在传统语言学中并不占显著的地位。传统的

中国语言学大致相当于所谓的“小学”，由音韵、训诂、文字三大部分组成。小学是经学的附庸，方言学则是训诂学的附庸。在体现中国古代学术分类思想的《四库全书》中，方言学著作只收扬雄《方言》一种，它是附在小学的训诂之属中的。

1. 古代汉语方言研究的兴起时期

古代调查和记录方言的工作早在周代就形成高潮。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方言学是在距今 2500 年前的周代兴起的。附在《方言》书末的扬雄《答刘歆书》说：“尝闻先代辘轳之使，奏籍之书，皆藏于周秦之室。”汉代应劭《风俗通义序》说：“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辘轳之使，求异代方言。”从这两段记载可知：周代政府已设有调查方言的专职官员，他们每年秋收后乘着轻车到各地采集民歌、童谣和方言异语等，并将调查记录的方言材料收藏保存，以供朝廷作为考察民情的依据。可惜周室东迁之后，这个制度便废止了。周秦时代语言与方言颇多分歧。周朝统治者因政治的需要，很重视语言交际，所以专门组织调查方言工作。再者，调查方言也是统治者观风问俗，了解民情的一条途径。不过汉代的学者关心这些调查所得的材料却只是为了研究训诂，并不是为了研究语言或方言本身。《答刘歆书》说，严君平、林间翁孺“深好训诂，犹见辘轳之使所奏言”。

传统方言学的第一部专著是西汉末扬雄所撰的《方言》。此书原名《辘轳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旧唐书·经籍志》略作“别国方言”，又称“殊言”，从汉末应劭开始，简称为“方言”。南宋庆元六年（公元 1200 年）浚阳太守李孟传刻本是现存最早的版本。《方言》旧题汉扬雄撰，但《汉书·扬雄传》和《汉书·艺文志》皆无关于扬雄编《方言》的记载。汉末应劭在《风俗通义序》中首次提出为扬雄所撰。宋人洪迈曾怀疑《方言》非扬雄所作，清人戴震则认为出于扬雄之手。后来卢文弨、钱绎、王先谦、王国维、罗常培等都认为应劭所说是真实可信的。《方言》是中国第一部比较方言词汇的重要著作，也是中国第一部方言词典。此书涉及的地域，东起东齐海岱，西至秦陇凉州，北起燕赵，南至沅湘九嶷，东北至北燕朝鲜，西北至秦晋北鄙，东南至吴越东瓯，西南至梁益蜀汉。书中所收不仅包含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各地区的汉语方言词汇，还有少数民族语言词汇。《方言》是一部方言词汇集（其中可能包括了某些非汉族语言），作者通过面询方式进行方言调查，全面记录各地的口语词，然后加以条分缕析，纵横比较，将所记词语按通行的地域范围分别标注为凡语，通语，凡通语，四方之通语，某地与某地之间语，某地语，以及转语、代语、古今语、古雅之别语等类型。但是，《方言》的最大缺陷是仅释义，不注音。

晋朝郭璞为《方言》作注。晋惠、怀二帝时，河东骚乱，他为避乱长途跋涉一年多，定居江东，途中调查搜集到不少方言材料。他继承和发扬扬雄调查研究口语词汇的传统，用晋代活的口语词汇与汉代词汇作比较，不仅对原书作了注解，并且从多方面扩充了原书的内容，特别是注明原书词条在晋代通行区域扩大和词义伸缩的情况，并用晋代反切或同音字注音。所以，郭璞《方言注》可以说是《方言》的续编。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郭璞《方言注》是一部杰出的方言学著作外，还产生了许多反映方言的韵书、韵图，例如李登的《声类》、吕静之的《韵集》、夏侯咏的《韵略》、阳沐之的《韵略》、周思言的《音韵》、李季节的《音谱》、仕台卿的《韵略》等。这些著作中“各有土风”的韵图大致相当于方言同音字表。作为中国，也许是世界上最早的同音字表，它们在方言学史上应占很重要的地位，可惜它们早已亡佚不存。

2. 古代汉语方言研究的衰落时期

随着时代的发展，隋、唐、宋、元是方言研究的衰落时期。主要表现在：一是抛弃了调查记录方言口语的优良传统；二是没有真正意义的方言学著作诞生。

隋、唐、宋、元也有些韵书和笔记杂谈类著作涉及方言，前者如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原为北曲的用韵而作，但客观上描写了当时以大都为代表的北方方言口语语音系统；后者如唐代颜师古的《匡谬正俗》、宋代王应麟的《困学纪闻》等。到了明代，此类笔记杂谈著作就更多了，如陶宗仪的《辍耕录》、郎瑛的《七修类稿》、岳元声的《方言据》等等。严格地说，这两类著作都不能算作方言学专著。

3. 古代汉语方言研究的鼎盛时期

古代对方言的研究在明清时期达到了鼎盛。在明代近300年间，值得一提的方言学专著是李实的《蜀语》。《蜀语》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研究地区方言的著作，此书一改晋代郭璞之后知识界轻视方言的错误倾向，重新恢复调查、记录和研究方言口语的优良传统。全书收录考证四川方言词汇600多条，所收条目前后连贯，不分卷，也不分类，内容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等。书首有自序一篇，批评“学士家竟避俗摭雅，故残今而贵古”，认为字无俗雅，方言皆有“典据”，说明本书编写目的是就其所知指出方言的典据。但是实际上引经据典考证的条目不多，而以记录口语为主。

清代是传统方言学的全盛时期。清代的方言学专著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疏证校勘扬雄《方言》的著作。重要的有戴震的《方言疏证》、钱

绎的《方言笺疏》、王念孙的《方言疏证补》。这些著作对《方言》有订讹补漏、校正阐发之功。

第二类：沿袭《方言》体例，比较研究方言词汇的著作。重要的有杭世骏的《续方言》、程际盛的《续方言补》、程先甲的《广续方言》、张慎仪的《续方言新校朴》等。这些著作只是搜集和载录古文献所见的古代书面方言词汇，并没有继承发扬雄调查记录活的方言口语词汇的长处。

第三类：分地研究方言词语著作。此类著作是由上述《蜀语》开风气之先，后继者有清代范寅的《越谚》、毛奇龄的《越语肯綮录》、胡文英的《吴下方言考》等。明末清初张慎仪的《蜀方言》也是仿《蜀语》之作，作者在凡例中说：“扬子《方言》兼采异国殊语，不限一域。断域为书，始于李实《蜀语》。而清毛奇龄《越语肯綮录》、胡文英《吴下方言考》……皆胜于李。予撰《蜀方言》二卷，窃欲步其后尘。”所评甚是，不过张书侧重引经据典，考证本字，未得《蜀语》注重记录方言口语词汇之旨。体例参照翟灏《通俗编》，一般每条先注明本字，再引其字在字书、韵书或其他文献中的出处。例如：“船尾曰艖。《集韵》：艖，师交切。音梢。船尾。”

第四类：地方韵书。清代的地方韵书很多，尤以闽语区的地方韵书为最盛，如《戚林八音》（福州）、《汇音妙悟》（泉州）、《拍掌知音》（泉州）、《雅俗通十五音》（漳州、厦门）、《潮汕十五音》（潮州、汕头）。其他方言区也有地方韵书，如《千字同音》（广州）、《五方元音》（河北）等。这些著作除了分析方言的声韵调系统，解释方言词汇的词义外，还收录很多方言本字和方言俗字。

二、近代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对汉语方言的研究阶段

1. 近代西方传教士对汉语方言的研究

明清以来，西洋传教士纷纷来华，他们为了传教而研习汉语方言，编写方言课本和方言词典，用方言翻译《圣经》，有的还撰写方言论著、绘制方言地图。例如，利玛窦（Matteo Ricci）的《西字奇迹》（1605）、《利玛窦中国札记》（1615），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西儒耳目资》（1626），万济国（Francisco caro）的《华语官话语法》（1703），马礼逊（R. Morrison）的《通用汉言之法》（1815）、《广东土话字汇》（1828），麦都思（W. H. Medhurst）的《福建方言词典》，裨治文（E. C. Bridgman）的《广东话汉语读本》（1839），艾约瑟（J. Edkins）的《上海方言语法》（1853）、《汉语官话口语语法》（1864）和《北京话语法》（1871），湛约翰（J. Chalmers）的《英粤字典》（1859），白德温（R. S. malay）的《福州话

音序词典》(1870), 杜嘉德(C. Douglas)的《厦门话汉英口语大词典》(1873), 睦礼逊(W. T. monson)的《宁波话英汉词典》(1876), 帕克(E. H. Parker)的《广东话音节表》(1880)、《新广东词汇》(1880)、《客家话音节表》(1880)、《福州话音节表》(1881)、《温州方言》(1884)、《新福州口语词汇》(1897), 卜舛济(F. L. H. Pott)的《上海话课本》(1907), 穆麟德(P. Mollend)的《宁波方言便览》(1899), 何美龄(K. Hcmeling)的《南京官话》(1902)以及上海、苏州、杭州、金华、宁波、台州、温州、福州、厦门、莆田、汕头、海口、广州、嘉应州等方言的《圣经》译本,《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02)》在介绍中国的语言和方言时还绘制了一幅汉语方言分布图。西洋传教士对汉语方言的此类描述对汉语方言研究不乏参考价值,可惜长期以来鲜为人知,因而对汉语方言学几乎没有产生影响。不少重要资料和成果至今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2. 汉学家对汉语方言的研究

一些西方学者也对汉语方言作过研究。德国语言学家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从通用语言学的角度写过《论汉语的语法结构》和《论语法形式的通性以及汉语的特性》(1826)。另有一些西方汉学家则对汉语方言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其中有些论著对汉语方言学具有重要价值。英国汉学家、驻华公使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根据教西方人学汉语的多年经验,于1867—1902年编著并两度修订再版北京话口语课本《语言自述集》,首创威妥玛式拼音,并全面记录了19世纪中叶的北京话,保存了一份宝贵的北京方言历史档案。瑞典语言学家高本汉(K. B. J. Karlgren)调查了广州、汕头、福州、温州、上海、北京、开封、怀庆(今河南沁阳)、归化(今呼和浩特)、大同、太原、兴县、太谷、文水、风台(今山西晋城)、兰州、平凉、西安、三水、南京等20多方音,并引用客家、四川方音和日本汉音、吴音、高丽音、安南音的材料,于1915—1926年陆续写成四卷本法文巨著《中国音韵学研究》,其中第二卷为“现代方言的描写语音学”,第四卷为“方言字汇”。194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三位中国语言学家花费近10年工夫悉心翻译并多有修正的中译本。高本汉是用现代语言学方法系统地调查汉语方言的第一位学者,对汉语方言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此外,辅仁大学教授比利时学者贺登崧(W. A. Grootacs)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关于方言地理学方法的介绍和示范性调查研究也富有启发性,但由于某种原因,在很长时间内并未产生重大影响,半个世纪之后,才出版了他的《汉语方言地理学》中文版。

三、现代汉语方言的研究阶段

1. 开始阶段

1918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热潮中,北京大学以蔡元培校长的名义号召全校师生广泛收集全国近世歌谣,在预科教授刘复主持下,由《北京大学日刊》每天发表一首。1920年,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沈兼士、钱玄同、周作人等发起成立“歌谣研究会”。1922年,作为北大校庆25周年的一项重要学术活动,《歌谣》周刊创刊。在采集民间歌谣的过程中,一些学者逐渐认识到方言研究的重要性。1923年,《歌谣》周刊发表一组倡议建立汉语方言学科的论文,从而将方言调查和研究纳入了科学的轨道,并加以明确的学科定位。中国的现代方言学是在1923年揭开序幕的。

1924年1月,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成立了“方言调查会”,同年该会发表方言调查宣言书,提倡调查研究活的方言口语。林语堂等人还设计了以国际音标为基础的方音字母草案,并且用这套字母标注了北京、苏州、厦门等14种方音作为实例,不过没有见到他们继而发表过什么实际的方音调查报告。以方言调查会为中心的学者可以称为歌谣派。歌谣派的历史虽然很短,只有三年(1923—1925),实际工作也做得不多,但是它的诞生却是中国方言学研究的历史转折点,标志着以今方言和古文献互相证合为目的的中国传统方言学的结束,同时也是注重调查研究活的方言口语的现代方言学的滥觞。

在此阶段,歌谣派以他们的远见卓识指明汉语方言研究的新方向,刘半农则做了一项实际的专题研究工作,即以语音实验仪器研究汉语方言声调,写成《四声实验录》一书,于1924年在上海出版。此书包括12个汉语方言声调的实验报告,实验所用的仪器是浪纹计(kymography)。刘半农1919年就读于伦敦大学,并在该校语音实验室工作,后改入巴黎大学攻读博士。此书即是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也是中国第一部实验语音学专著。不过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当时的实验结果与方言声调音高的实际曲线相差甚远,也许是仪器不够精密之故。

2. 发展阶段

发展阶段是以赵元任的两项重要研究揭开序幕的。1926年,与刘复同年回国任清华学校研究院导师的赵元任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方言学论文《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1927年,他率杨时逢实地调查了33处吴方言,内容包括音系、字音、常用词、语助词和成篇语料。1928年写成《现代吴语的研究》,作为清华学校研

究院丛书(第四种)出版。这部著作对汉语方言学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是汉语方言学最终确立的重要标志。

192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翌年,历史语言研究所挂牌,赵元任担任第二组(语言组)主任,罗常培、李方桂为研究员。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由此进入了第一个10年黄金时期。赵元任设计了一套科学而便捷有效的汉语方言调查程序,他撰写的《钟样方言记》(1939)成为当时方言调查研究报告的样本。从1928年到1936年,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了6次大范围的方言调查,先后调查了两广(包括海南)、陕南、皖南、江西、湖南、湖北等地方言。但是,日本方面侵华战争阻滞了正趋高潮的方言调查及其成果的整理出版,8年抗战期间仅调查了云南、四川两省方言,迟至1948年才出版了《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多年以后,才在台湾陆续整理出版了《绩溪岭北方言》、《湖南方言调查报告》、《四川方言调查报告》、《云南方言调查报告》。这一时期汉语方言(主要是方音)调查研究的重要成果还有陶燠民的《闽音研究》(1930)、黄锡凌的《粤音韵汇》(1941)、董同龢的《华阳凉水井客家话注音》(1948)。

3. 普查阶段

1954年,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设立以丁声树、李荣为正副组长的方言组。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在《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中提出:“为了帮助普通话的教学,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应该会同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组织各地师范学院和大学语文系的力量,在1956年和1957年完成全国每一个县的方言初步调查工作。各省教育厅应该在1956年内根据各省方言的特点,编出指导本省人学习普通话的小册子。”同年2月16日,教育部和语言研究所共同举办的第一期普通话语音研究班开学。3月20日,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联合发出《关于汉语方言普查工作的通知》。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由此进入了大丰收的第二个黄金10年。普通话语音研究班的主要课程,除了徐世荣的“普通话语音”外。还有李荣的“方言调查”,前三期还有周殿福的“语音学”、丁声树的“汉语音韵学”等配套课程。丁声树、李荣为此编写了《汉语方言调查手册》、《汉语方查简表》、《汉语音韵讲义》,以及《古今字音对照手册》,语言研究所编制了《方言调查字表》、《方言调查词汇手册》。马学良、岑麒祥也分别编写了《语言调查常识》和《方言调查方法》。1956—1959年的大规模方言普查共调查了当时全国2298个县市中1822个县市的方言,覆盖面高达80%。调查成果共编成各省区方言概况20种。各地学习普通话手册320多种。其中正式出版的,前者有《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1960)、

《四川方言音系》(1960)、《河北方言概况》(1961)等3种;后者有70余种。这次规模空前的方言普查积累了丰富的方言资料,对推广普通话起了重要作用,并为汉语方言学日后的发展积累了经验,锻炼了队伍。1960年,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河北省昌黎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著的《昌黎方言志》记音准确,分析细致,内容全面,体例完备,成为方言调查报告新的样本。

与此同时,北京大学1952年设立二年制语言专修科,专门培养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方面急需的专门人才。1955年开始为汉语专业本科开设“汉语方言学”基础课程。1960年,袁家骅为此主编了第一部汉语方言学教材《汉语方言概要》,开始了汉语方言的综合性研究和方言研究人才的科班培养。不久又陆续配套出版了《汉语方音字汇》(1962)和《汉语方言词汇》(1964),成为现代汉语方言比较研究的重要著作。这套著作为培养新一代高层次汉语方言学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

四、新时期汉语方言的研究阶段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创办《方言》季刊。1981年11月23日,全国汉语方言学会成立,汉语方言学从此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成果不断涌现,大大超过了前50年的发展,其中仅《方言》季刊发表的论文就达一千篇以上。其他重要研究成果也纷纷问世,例如,温端政主编的《山西方言志丛书》,周振鹤、游汝杰共同编著的《方言与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共同完成的《中国语言地图集》,许宝华主编的《上海市区方言志》,詹伯慧主编的《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汉语方言和方言调查》和《广东粤方言概要》,钱曾怡主编的《山东方言志丛书》和《山东方言研究》,陈章太、李如龙共同编著的《闽语研究》,钱乃荣编写的《当代吴语研究》,李如龙、张双庆共同主编的《客赣方言调查报告》和《中国东南部方言比较研究丛书》,游汝杰编写的《汉语方言学导论》和《汉语方言学教程》,侯精一、温端政共同编写的《山西方言调查报告》,李荣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侯精一主编的《现代晋语的研究》、《现代汉语方言音库》和《现代汉语方言概论》,陈章太、李行健主编的《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吴启主主编的《湖南方言研究丛书》,王福堂编写的《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刘纶鑫主编的《客赣方言比较研究》,李如龙编写的《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华学诚编写的《周秦汉晋方言研究》以及各省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写的省区方言志。